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By ERIK MUEGG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xiv, 376pp.

在《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中，柯文(Paul A. Cohen)呈現了三種解讀歷史的可能進路：由歷史學家解讀的、作為事件的，由親歷者體驗的、作為經驗的，及由作家與大眾媒體等創造的、作為神話的。儘管柯文呈現了多種可能的解讀歷史的進路，但他的落腳點仍是借由比較不同進路各自的特點，來釐清歷史學家在其中的自我定位（頁242-250）。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本書作者埃里克·繆格勒卻看到了混合進路解讀歷史的潛力。

繆格勒近年來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中國西南，他於2001年出版的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 以下簡稱《野鬼的時代》 )，曾在美國獲得麥克亞瑟天才獎 ( 可參見馬健雄的相關書評，《歷史人類學學刊》，第2卷，第2期〔2004年10月〕，頁175-179 )。如果說在《野鬼的時代》中，歷史僅僅是作為理解現實的工具，那麼在本書中，理解歷史則成為研究的目標，而文化正是協助理解歷史的一個中介。時隔十年，眼下這本著述見證了他從對經驗的研究過渡至對經驗與檔案的研究，從社區研究過渡至區域研究，從人類學研究過渡至跨學科研究的歷程。

本書講述了一段有關20世紀上半葉的往事。這段往事自1906年蘇格蘭植物採集者佐治亞·福瑞斯特(George Forrest)在玉龍雪山南麓山腳下的Nvlvk'ö村 ( Nvlvk'ö 為納西語村名，音譯為巫魯肯村，即現在的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玉湖村 ) 招募嚮導始，至1950年威尼斯裔美籍植物學家約瑟夫·法蘭西斯·查理斯·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由於對雲南西北部新的社會秩序之困惑與恐慌而與部份村民匆匆告別，踏上前往印度的飛機而告終。在這四十多年的歲月裡，兩代 Nvlvk'ö 村村民為西方的公園與科研機構在中國西部採集高山植物。第一代村民大約在25-30歲之間，在趙成章的帶領下受雇於福瑞斯特，他們勇敢、有技能且知識豐富。他們曾伴隨福瑞斯特在雲南進行七次遠距離的探險以採集高山植物，直至他於1932年去世。第二代參與採集的村民，是由12名第一代村民的兒子與侄子組成的，他們伴隨洛克前往了雲南北部、甘肅、一片現在屬於青海的高山草甸，以及四川西部的貢嘎雪山。在1928-1929年，由於供洛克採集植物的費用中斷、洛克對地圖繪製的興

趣和觀察一次納西葬禮的契機，他轉向對東巴文字的搜集、整理與翻譯。此後直至洛克離開雲南，許多村民成為他的資料搜集者、同伴、翻譯者與共同作者（頁16-17）。

對這樣一段往事的追尋，其深意何在？在繆格勒三百餘頁的敘述中，似乎可窺見三個維度之景象。

其一，是個體與土地之關係。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木氏家族在納西的擴張歷程（第二章）、東巴儀式與象形文字（第三章）、四川木里地方政權變更歷程（第六章）、甘肅地區回—藏之間軍事衝突的歷程（第七章）等政治、軍事與宗教歷史之分析，來建構繁衍生息在這一片涵蓋多元族群的區域的某一特定人群的心理；另一方面，作者透過探險家們的動機與足跡，試圖還原出探險家們（作者在書中將植物採集者、村民及所涉及的歷史上各個遷徙族群都定義為廣義的「探險家」），將他們對土地的理解「生成」為不同形式的文本與影像記錄（作者在書中將這些記錄稱為archive，後文用中文的「檔案」一詞予以指代）的過程。

其二，是個體與自我的關係。對這一部份的敘述主要集中於兩位西方探險家。透過對中、美、英三國搜集到的包括日記、回憶錄、傳記、照片、信件等史料的檢視，作者從中發現了許多可以討論這一命題的線索。作者使用當事人對所遇事件之記錄來說明這兩位探險家在中國西部之旅中所體驗到的諸多不確定性，同時結合當事人所記錄的心理感受，通過克里斯多夫·平尼（Christopher Pinney）對照相術的分析（頁172-174）、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對於身體的分析（頁161）、瓦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對翻譯的分析（頁272-273）等側面分析方法，試圖展現出當事人是如何適應這些充斥着不確定性的環境，又是如何因此產生了一種與人交往過程中的區隔感，並體會到疏離於社會生活之外的失落之情的心理過程。

其三，是個體與其他個體的關係。這部份側重描述兩位西方探險家與兩代村民及路途中邂逅的其他人群之間的關係，敘述方法與上一部份相似，但受文獻資料所限，其對第一代 Nvlvk'ö 村村民、路途中邂逅的其他人群的心理活動分析，多是經由福瑞斯特所提及的事件與行為、上述經由區域歷史對人群心理的分析等較為間接的材料推導而得，着墨較少，其給人大體上的印象是，其關係從起初較為區隔的關係，在共同經歷的洗禮下，發展出雙方對彼此的部份接納——作者提及這絕非一種完全接納——的關係。由於第二代 Nvlvk'ö 村村民中有人會與洛克合寫他們交往的回憶錄，而且洛克在其日記中不乏對具體人物的相關描述，所以作者的論述可以具體到洛克與某個村民

的關係，因此，作者專闢一章描述洛克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第8章）。在這一章及之後第九章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有的村民對他十分忠誠，有的村民和他在情感上十分親密與曖昧，有的村民視他為家庭的一員，有的村民則在政治運動中「無情地」進入他在村中的居所搜查武器。

要理解此書的立意，或可從標題中的幾個富含隱喻意味的關鍵詞入手。在解讀這一段往事時，作者時常提及的兩個關鍵詞為：檔案(archive)與體驗/experience。作者在文中多處談到兩者的辯證關係，其大意乃「檔案乃經驗所鑄就，同時又反過來框定了經驗」（頁286）。如果這一辯證關係成立，那麼當人們——尤其是像洛克一樣一直在尋覓土地之深層內涵的主體——在土地上移動己身之時，亦是在生成一條書面上的路(a paper road)（頁287），如果將土地人格化，那麼這不是一場人類的孤獨之旅，而是人類與土地的共同旅程。作者進一步談到，他心目中的土地，一旦人類開始行走於其表面和與它對話，它就一直在經歷一個生動的、社會的、有創造力的過程（頁290）。

作者對於土地之社會性與文化性之強調，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在《野鬼的時代》中的一段話：「無論地方還是時間，無論它們是天然形成的還是權力形塑的，它們都是被製造的。人們被經濟與政治的地理形態所形塑的景觀所支配，但他們是能動的主體；他們基於他們所處的地點，重塑這些地理形態並因此找到他們自己的行動路徑。有關時間的主要建構亦是如此。我的野心是在作品中一直關注『哪兒』與『何時』的問題。」（頁10）對個體能動性與政經結構支配性的辯證關係的重視，是自實踐理論興起後一個重要的人類學認識論基礎，作者似乎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這一辯證關係在時間與空間中的投射，理應引起同樣的關注。

如上所言，這也是一本跨界的著述，它對於個體性的深層經驗之關注，與歷史學研究中的微觀史研究有幾分相近，且它對當事人體驗之建構，較好地平衡了基於事實之上的推理與想像的關係；它對於文獻材料的運用，符合許多關注歷史學與人類學交匯之學者所公認的原則，不僅援引了較多一手材料並輔以較多不同主體撰寫的二手材料，亦並非簡單地複製材料到所需之處，而是對材料進行適度的分析。就以上兩個角度而言，這是值得一讀的出色文本。

此書之所以讀來有味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作者選擇了近代西方探險者在中國西部探險這一事件作為全書的線索，並將事件的背景放到當地多元的社會與文化的節奏裡漸次展開。這一方式有其適用性，亦有其局限。

一則，書中描述西方探險者的個體經歷時，具有較強的連續性，基本上對探險者從出生到死亡的歷程都有交待，這與一般的事件史側重以事件為中心而非以個體為中心的方式不同，但對於這一事件的其他參與主體的體驗之建構則相對簡單，在討論這些主體時，似乎只能又回到事件史的敘事框架。這一局限，部份是由於作者缺乏書中涉及的大量中國西部地區的田野調查（基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張文義老師提供的資訊，後者曾從第三者處了解這則資訊），而無法將更多的處理歷史的方式帶入研究中；部份是由於對歷史的這個側面或那個側面的選擇性敘述，取決於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的性質與總量。

二則，此著作能將不同地理區域和歷史時期聯繫起來，同時又能連接不同的社會與文化，是其別具一格之處。不過，這不應與區域社會經濟史混淆，正如柯文所言，當他只是對直接影響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的思想觀念感興趣時，他就沒有必要關注那些研究長期的和非個人的、常常是社會的或經濟的歷史進程，因為這些進程「發展變化極其緩慢，不易為人們察覺，所以極少左右人們的情感」（《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頁242-243）。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關注個體情感波動的繆格勒雖然總是強調經濟活動對於土地景觀形塑的重要性，但卻主要側重分析政治、軍事與宗教因素對土地景觀形塑的過程。

楊暘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The Lahu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A Response to Ethnic Marginalization on the Frontier.* By JIANXIONG MA. London: Routledge, 2013. xvii, 252pp.

馬健雄的英文新著《中國西南的拉祜族——一個邊疆族群對邊緣化的回應》，講述一個在當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社會體系已然崩潰，從而不得不以在我們看似非常極端的社會文化方式來「逃離」其族群身份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故事。這個讀來不免令人悲憤與憂傷的故事挑戰甚或顛覆了此前國家對「現代化」與「發展」的美麗預言。

作者基於1995年以來在雲南一個拉祜族社區的田野調查，通過對當地自